

司徒眉生与苏加诺总统的传奇故事

2018-03-31 22:20 阅读: 87

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649f7a400102x8v9.html?utm_source=bshare&utm_campaign=bshare&utm_medium=weixin&bsh_bid=1980832886&from=groupmessage



印尼开国总统苏加诺与新中国开国元帅陈毅
方学辉 FANG XUEHUI
1965年摄于雅加达

印尼开国总统苏加诺(右一)与新中国开国元帅陈毅及司徒眉生(左一)
方学辉 1965 年摄于印尼雅加达
编者按

1926 年，司徒眉生出生于印尼西瓜哇一个名叫苏加武眉的小镇。父亲司徒赞是印尼侨界著名教育家。印尼反抗日军侵占时，司徒眉生和父母、兄长都是抗日活跃人士。当时年仅 14 岁的司徒眉生为抗日组织递送情报，因组织暴露身陷日军监狱九个月，后被保释出狱。司徒眉生是位带有传奇色彩、参与创造历史的印尼华侨华人。他曾任印尼开国总统苏加诺的私人外事助理、首席华语翻译，紧随苏加诺总统左右长达 10 余年之久，亲身参与了印尼和中国高层的几乎所有会议、会谈，在促进中印尼两国的友好关系过程中扮演了辉煌之角色、立下了汗马功劳、做出了非凡的贡献。

司徒眉生于 2010 年 10 月 13 日在澳门病逝，享年 82 岁。



司徒眉生照

华侨华人的故事(第 63 篇)

司徒眉生与苏加诺总统的传奇故事

图文/曾坤 图/方学辉(印尼归侨)

文来源/摘自 曾坤 著《隐居澳门四十年》

司徒眉生何许人也？他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印度尼西亚开国总统苏加诺的私人外事助理、华语首席翻译，紧随苏加诺总统左右长达 10 多年之久，亲身参与了印度尼西亚和中国高层的几乎所有会议、会谈，亲眼见证了中印建交、中国参加万隆会议、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以及恢复印中邦交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他以一个“民间外交家”的独特身份，在多次涌动过波澜的两国友好关系中，发挥了重要而奇特的历史作用，其功不可没。

往事并不如烟。已 82 岁的司徒眉生先生，完全没耄耋之相。开阔的额头，光泽的脸膛，双眸有神，仪态雍容。每次接受我采访时，他都穿得整洁笔挺，言谈举止中透出一种尊贵的气质，一看就知道是个博雅通脱之人。当他穿过历史的云烟寻找那些光阴碾过的印痕的时候，几乎每一个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

救命之恩

追忆 1965 年 9 月的那段日子，司徒眉生至今惊骇不已。他对记者说：“若不是苏加诺总统及时救援，我早已成了政变右翼军人的刀下鬼。”

1965 年印度尼西亚“9·30”灾难，不仅对司徒眉生充满了血腥与恐怖，对整个印度尼西亚大众，特别对印度尼西亚华侨、华裔来说，更是现代史上一起极为罕见的血腥大屠杀。事后，印度尼西亚的外交部和警察总署供认，有一百万平民被屠杀，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印度尼西亚华人。另有六十万名未经任何审判被关进监牢。西方把这次屠杀称为“20 世纪最惨忍的集体谋杀”。

所谓“9·30事件”，根据印度尼西亚方面的报道，是指1965年9月30日，以印度尼西亚总统警卫部队第三营营长翁东中校为首的一批军官，借陆军“将领委员会”阴谋发动军事政变为由，逮捕和打死了包括陆军司令雅尼在内的六名将领。随后，时任印度尼西亚精锐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苏哈托为首的几名将军又采取反制措施，挫败了翁东中校等的行动。随即把“9·30事件”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甚至苏加诺总统联系起来，掀起反共歇斯底里，血腥镇压和清除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亲苏加诺总统的政治势力，以夺取陆军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与此同时，政变右翼军人又大肆制造“共产党受到了北京的支持”，并发展到派军队搜查中国大使馆商务处，与中国的关系迅速恶化，直至中断关系。

就在这令人窒息的局势中，一向以协助苏加诺总统与中国朋友沟通和会谈的总统私人顾问兼华语翻译司徒眉生，更身处凶险之境。雅加达军区司令部的一位朋友冒着生命危险，打电话紧迫地告诉他，政变当局已将其列入清除名单，即将对其下毒手。几乎是在同一时间，陆军的一位将军也亲自向苏加诺总统报告了企图绑架司徒眉生的阴谋。

已处于软禁中的苏加诺总统，得知消息后怵然而惊，立即决定让司徒眉生暂避国外，以保障他的生命安全。

骤来的横祸，容不得司徒眉生有半点迟疑。他行色匆匆赶往雅加达马腰兰机场。不料，消息走漏，正当他准备乘机时，右翼军人政变当局下令对其进行阻截。紧急关头，司徒眉生提出要打电话向总统府报告受阻情况，以便总统了解。幸好，在机场当值的一位中校军官允许了他的请求。

电话终于拨通了，接电话的是总统府办公厅主任雅明。他感到事态严重，赶紧向总统报告。苏加诺马上嘱咐雅明：“传他的命令给这位中校军官，让司徒眉生立即回总统府”。当时，政变当局还没有公开要推翻总统的企图，故这位军官不假思索就执行了总统的命令，放司徒眉生回到总统府。

苏加诺总统觉察到事态的严重性已超过了自己原来的估计，目定唇翕，面作青色。沉默了一会儿，终于开口，道：“让司徒眉生先生马上去香港！”并随即签署了两道手谕，一道给地方掌权者，一道给司徒眉生本人。然后，又叫来总统警卫团副团长马尔韦·赛兰上校，面授机宜：“明天清晨，你亲自护送司徒眉生到马腰兰机场，送上飞机，要绝对保证安全。”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马尔韦·赛兰上校与参谋人员商量出一个如何安全通过军方检查的合理理由：因当时司徒眉生还兼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保健小组秘书一职，故派司徒眉生和总统私人医生刘英昌博士一起去欧洲，为治疗总统疾病寻购药品。翌晨，在雅加达军区司令部有关军官的配合下，马尔韦·赛兰上校圆满完成了护送司徒眉生安全出国的任务。

1965年11月4日，司徒眉生匆匆告别了生于斯养于斯的国土，经过10多个小时的飞行，平安抵达荷兰。稍事停留，再由荷兰转乘飞机到香港。不料，惊魂未定的他，又遭到港英政府的拒绝，不得不再转赴时属葡萄牙殖民管治的澳门，并从此在这里定居下来。



1965年11月4日司徒眉生（中）离开印尼前在马腰兰机场，右一为司徒太太

火车上结识苏加诺总统

司徒眉生与苏加诺结识，早在印度尼西亚得到国际公认真正独立之前。

1945年日本投降后，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运动更加风起云涌，在苏加诺和另一位民族运动领袖哈达的领导下，爆发了“八月革命”，8月17日宣布独立，成立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苏加诺与哈达分别当选总统和副总统。

但不久，荷兰殖民军卷土重来，立足未稳的新生政权不得不离开雅加达，将共和国首都临时迁往日惹。

位于印度尼西亚中爪哇南部的历史名城日惹，虽然是荷兰扶持的苏丹王朝领地，但却有反对殖民主义斗争的光荣传统。19世纪初曾与荷兰殖民者战斗达五年之久，因此，也是当时印度尼西亚历史命运的一所“吉宅”。印度尼西亚宣布独立和迁都日惹时，苏丹哈孟古·布沃诺九世给予全力支持。

1946年夏季，年仅19岁的司徒眉生，以印度尼西亚华文报纸《天声日报》临时记者的身份，第一次被派遣采访重要国务活动——共和国“临时国民大会”，“临时国民大会”选在离日惹400多公里的玛琅召开，司徒眉生先从雅加达飞抵日惹，然后又乘火车赶往玛琅。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苏加诺也同乘一趟列车赶往玛琅，而且，此行竟与苏加诺结下不解之缘！

记不清火车走了几个小时了，忽然苏加诺总统来到记者云集的车厢里看望。他逐一和每个记者握手问候，当得知司徒眉生是其中最年轻且又是仅有两位华人记者时，马上产生了兴

趣。因当时能掌握纯正印度尼西亚语言文字的华文记者很少，好奇地询问：“你的印度尼西亚话在哪学的？”

司徒答：“是专门在一个印度尼西亚文补习班学了一年多。”

苏加诺听后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似乎留下很深印象。在接下来的行程中，苏加诺总统又两次过来与司徒眉生聊天。最后一次要分手时，问司徒：“你到玛琅有住的地方没有？”

“谢谢您，有，由大会统一安排。”司徒很感激地回答。

苏加诺诚恳地说：“万一住宿有问题，找我的副官。”随即把副官介绍给司徒眉生：“如果没地方住，你就同他住在一起。”

三天的“临时国民大会”，司徒眉生虽然天天都能在会场见到总统的身影，但终没有碰面的机会。一直到返回路上，记者们依然和总统一趟专列，司徒才又见到苏加诺。

“住的怎样？”总统见面就问。“有地方住，所以就没有去打扰您。”司徒眉生回答。

“你什么时候回雅加达？如果来得及，到总统府来聊聊。”苏加诺回过头又叮嘱副官一句：“你去找他。”谁知，抵达日惹后的第二天下午，总统副官就开车到司徒眉生下榻的宾馆来接他去总统府。

总统和司徒眉生足足聊了半个多小时，详细询问了他的家庭、个人经历等情况。显然，总统心里已经在酝酿着什么。末了，苏加诺交代副官：“以后眉生再来日惹采访，你一定要引他来见我。”

从此往后，司徒眉生与苏加诺总统的交往正式开始了。

转眼到了1949年末，与荷兰签订圆桌会议协议。1950年8月，苏加诺宣布成立统一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共和国政府和苏加诺总统正式还都雅加达。此时的司徒眉生，已经成了可以自由进出总统府的熟客，苏加诺总统与司徒眉生之间也相知日深。总统越来越喜欢这个既会中文（包括普通话、广东话、客家话），又懂荷兰语、英语、印度尼西亚语的朴实勇敢的小伙子；而司徒眉生则更加敬重这位浑身洋溢着理想与才华的开国元首。

有道是，机遇永远属于那些有准备的人。苏加诺从中学时代起，就深受中国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印度圣雄甘地的不合作主义的影响，对政治运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是一位反帝、反殖、争取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的伟大的民族主义者。而司徒眉生从小跟随父母从事反对

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十四、五岁时就曾坐过日本侵略者九个月的牢狱，饱经磨练，也是一位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共同的理想，让他们迅速聚拢在一起；共同的追求，更让他们看到彼此在未来征途中的价值。

如果说，司徒眉生认识苏加诺总统纯粹是一种巧合，那么，苏加诺对司徒眉生的赏识与重用，却是有备于事业与志向的需求。



时为战地记者的司徒眉生（摄于1948年）

见证新中国首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递交国书

苏加诺作为亚洲新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的开国元首，从他最初发动反抗荷兰殖民统治的民族主义运动之日起，就对邻国——中国风起云涌反帝、反殖民统治的斗争，素有一种“同命相连”的情怀。所以，一俟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苏加诺立即通电予以承认，并作为极少数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早建立了外交关系。

也正是基于这种大背景的考虑，苏加诺对有华裔血统的司徒眉生，在逐渐赏识的过程中，更表现出一种“另眼相看”的关爱。他在迁都回雅加达之后不久，即破例给司徒眉生颁发了进出总统府的通行证，甚至叫司徒眉生每天早上六点赶来总统府陪他散步。其实，名为散步，实际上是在“耳提面命”，手把手地教司徒眉生，从地理历史说到社会新闻，从国际政治又讲到亚洲民族主义运动的前景，从读什么书到各种植物的拉丁文名字，谈话的内容都围绕着两个字：“育导”。并常常用一句话激励司徒眉生：“你什么都不懂，怎么担当重任？”

从这时开始，司徒眉生就如饥似渴地寻找中国历史及有关国际问题书报苦苦研读，经常是“挑灯夜读”，连交女朋友的时间都没有了。

接连两个月的散步中，苏加诺对司徒眉生谈了很多。谙世未深的司徒眉生，开始慢慢悟出点什么来：“是要培养我成为构架印中友好关系的有用人才？”果然，司徒眉生的感悟很快得到了证实。一天下午，苏加诺总统通过副官通知他：“明天，中国大使要来总统府递交国书，你要穿好西装，在旁边观礼。”

一听“中国”这个名字，司徒眉生的心中立刻涌起血缘般的情感。他虽身为印度尼西亚公民，但对来自家乡中国的一切信息都如饥似渴。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即新中国刚成立时，世界已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时期，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当时，美国政府对新中国抱着敌视态度，不仅自己不肯承认新中国，还竭力阻挠其它国家承认新中国。为了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外交孤立政策，为此，毛泽东用非常生动的语言，提出新中国外交思路，即“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三条方针。

“另起炉灶”，就是同旧中国的屈辱外交彻底决裂，不承认旧中国同其它国家建立的外交关系，要在新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是要在彻底清除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残余势力之后，再请客人进来，以免敌对者“钻进来”捣乱。

“一边倒”，即倒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

在这种外交方针的指引下，新中国一宣告成立，立即与被称为“社会主义老大哥”的苏联首先建立了外交关系。接下来的三个多月内，又同 11 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它们都是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稍后，又积极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发展友好关系，1950 年 4 月 17 日，亚洲新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印度尼西亚与新中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从而成为新中国派出首批 15 个驻外大使的国家之一。

新中国派出的首批 15 个驻外大使中，包括耿飏、黄镇、柴军武、王幼平、韩念龙在内的绝大部分，都是从人民解放军各部队或军区调来的兵团级、军级以上的干部，被人们称之为“将军大使”。但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的王任叔（巴人），却是一个例外，他是一位彻头彻尾的文化人。

王任叔为蒋介石浙江奉化同乡，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从事左翼文化工作，是知名的“左翼”作家，作品几乎涉及文学领域的所有体裁，且兼及翻译。抗战期间前往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部，与当地人民一起抗击日本法西斯，熟悉印度尼西亚的情况，在当地又有相当的影响。也许正是这段特殊的经历，才使 49 岁的作家王任叔，有幸跻身于这批平均年龄只有 40 岁左右的将军大使行列中。

1950 年 7、8 月间，包括王任叔在内的新中国首批大使陆续抵达驻在国，头一桩事，就是履行平生第一次向驻在国元首递交国书的使命。

王任叔大使向苏加诺总统递交国书的一刻，作为陪客的司徒眉生，穿得最讲究。洁白的衬衣上配有一条黑缎暗条的领带，外穿一套藏蓝色笔挺西装。他以总统府“工作人员”的身份盛装出场，亲眼目睹了新中国驻印度尼西亚首任大使王任叔向苏加诺总统递交国书的礼宾全过程。礼毕，苏加诺第一次明确对司徒眉生道：“是想要你见识一些大场面，虽然你什么也不必做，因为王任叔大使带来了中国的印度尼西亚语文翻译伍英光。”

司徒眉生怔住了，一时也不知道如何表态。此时此刻，司徒眉生才真正意识到苏加诺总统为他所设计的辉煌前程，心里充满了感激。他下定决心，要为推进印中两国及两国人民世代代的友好关系，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



印尼副总统梅加瓦蒂与司徒眉生的合影

他是我父亲信任的人

那是 2002 年第一天，司徒眉生一家三代人起了个大早，洗漱穿戴都比平时讲究了许多。不到九点钟，除了太太，全家老小已经齐集港澳码头，热切期待着一个令人喜出望外时刻的到来——迎候专程来澳门看望他们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副总统、苏加诺总统之女梅加瓦蒂。

其实，前一天，即 2001 年 12 月 31 日，司徒眉生已专程去香港拜见过梅加瓦蒂副总统。梅加瓦蒂是在出访途中，在香港作短暂停留的。她一到香港就嘱托印度尼西亚驻香港领事馆跟司徒眉生取得联系，希望在香港能与司徒眉生夫妇晤面。司徒眉生接到电话，便起身坐船赶往香港。一见面，梅加瓦蒂劈头就问：“婶婶怎么没来？”

司徒眉生歉疚地回答：“真对不起，她刚刚做完心脏手术，不然，怎么会不来看您呢。”一听说司徒眉生妻子做了心脏手术，梅加瓦蒂副总统的话题全部集中在询问病情和手术经过上。末了，态度至诚地对司徒眉生说：“我要去澳门看望婶婶。”马上又转过头叮嘱在场的印度尼西亚驻香港总领事：“请您马上安排我们明天去澳门做私人访问的行程，好吗？”

尊为一国副总统的梅加瓦蒂，为什么对异国他乡的一介平民如此敬宠？副总统身边的人都心揣好奇。

梅加瓦蒂盯着司徒眉生，像是在做解释又像是自言自语，用政治家独有的语言只说了一句：“他是我父亲信任的人”。听了这话，年轻人不解其意。只有司徒眉生本人心知肚明，思绪一下子又回到几十年前那段令他难以忘怀的岁月，心潮跌宕起伏。

后辈们怎么会知道，当年，梅加瓦蒂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她家的门坎儿，司徒眉生就跨进跨出的。他不仅和梅加瓦蒂父亲、母亲熟，而且和梅加瓦蒂兄弟姐妹都熟。梅加瓦蒂在任何场合都叫他“叔叔”……

第二天上午9点15分，当梅加瓦蒂副总统率领50多人抵达澳门港澳码头时，外界对她的到来尚一无所知。因为，按照梅加瓦蒂的要求，一不惊动澳门官方，二不在澳门留宿，看望完司徒眉生夫人当晚即折返香港，一切接待工作由司徒眉生一家负责。

但是，梅加瓦蒂毕竟是一国之副总统。为慎重起见，头一天，司徒眉生专门向澳门特区政府和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呈递了书面汇报，并声明不要官方做任何安排。但行政长官何厚铨仍当即做出批示，要求在尊重印度尼西亚贵宾意愿的前提下，尽可能提供一切必要的安全、服务保障，并委派特首办公室主任何永安先生代表特区政府和他本人，到港澳码头迎送印度尼西亚贵宾。

出了码头，车在行驶，梅加瓦蒂对司徒眉生叮咛：“直接去家看婶婶。”司徒眉生连忙做解释：“家里地方太小，这么多人也容纳不下啊，我安排了另外一个大点的地方，我太太在那里恭候您呢。”

恭敬不如从命，梅加瓦蒂犹豫片刻，终于点点头，没再坚持去司徒眉生家。接下来的行程，一切依司徒眉生事先安排好了的接待方案进行。先是参观了大三巴、黑沙滩等著名景点，七转八转，一直到午饭时，梅加瓦蒂副总统乘坐的旅游大巴才在一家五星级酒店——凯悦酒店门前停下来。司徒眉生将这家酒店一间葡国餐厅全部租用，作为一家人与梅加瓦蒂会面的正式场所。

司徒眉生为这次会晤，可算得竭尽全力。餐厅很大，可以同时供吃饭、联欢用，还备有小型乐队。澳门的葡国餐，实际上是融葡萄牙、粤菜及东南亚等风味于一身的西餐。其中的名肴：烤牛排、炸大虾、葡国鸡、咖喱炒菜……司徒眉生悉数点到。单是饮料就有咖啡、印度红茶、福建武夷大红袍、安溪铁观音、杭州龙井等。另备有1992年产的葡萄牙红葡

萄酒，茅台酒，青岛啤酒等。每台餐桌上还摆放一篮鲜花，司徒眉生又叫人买来一些澳门各式“手信”（特色点心），搁在一个个白色细瓷盘中。

这一餐饭，他们一行人就像家人团聚一样，吃得很惬意，也很悠闲。司徒眉生和夫人更是一脸喜色，他们分坐在梅加瓦蒂两旁，三个人一会儿窃窃私语，一会儿朗声大笑。似乎有说不完的话，聊不完的天。

弹指一挥间，自离开印尼，40年过去了，司徒眉生早已完成了人生命运的巨大转换。但是，岁月峥嵘，却怎么也抹不去苏加诺父女两代人对他的那片深情厚意。